

◀ (上接10版)

这六个故事实际上是环环相扣的。蒲安臣大家都知道,他是第一任美国驻北京公使,摇身一变成中国出使全世界的使臣。无论从哪个角度看,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推迟了美国《排华法案》,因为在1882年前,《排华法案》几次放到美国总统那里,美国总统都说,《蒲安臣条约》墨迹未干,我们不能这样做。写留美幼童,是因为蒲安臣条约直接导致了留美幼童的计划,因为第七款、第八款中美两国人民可以自由往来,可以求学、访问,两国是平等的。曾国藩、李鸿章要出使到国外,为什么选择美国?各位想象一下,1872年的美国什么都不是,刚刚打了一场血淋淋的

内战,正在进行战后重建,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些大学也没法跟欧洲名牌学校比,剑桥、牛津、巴黎大学、柏林大学都是上百年历史,哈佛当时实际上不算世界名校,但留美幼童到他们那儿去了。这120个人里,就有中华民国的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和袁世凯心腹蔡廷幹。1912年哈佛前校长 Charles W. Eliot 代表卡内基基金会出访中国和日本,他在中国时跟唐绍仪、蔡廷幹说,要以卡内基基金会的名义,给中国遴选最好的宪法专家。结果古德诺来到中国。

留美幼童中还有一个人叫梁成,就是他在1908年说服美国老罗斯福总统把庚款余额拿出来让中国可派学子到美国留学。胡适就是庚款留学生,1919

年邀请他的老师杜威访华讲学。所以你看,本书的各章节实际上环环相扣。

如果大家看过我的《边缘人偶记》,就知道对于哪些该写哪些不写,我一直有好多纠结。立新说得对,传教士理应成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重要部分。在我构思此书时,我考虑过卫三畏、司徒雷登、赛珍珠、白修德、费正清、卢斯、林语堂等人。我在耶鲁大学档案馆把卫三畏的所有档案都看完了,也在哈佛档案馆看过部分白修德、费正清等人的案卷。但最终我决定不写他们,觉得我没法写。一些题目如果我觉得跟我的全书架构关系不大的话,一般不写,或者别人已经写过的了,我写不出新意,就不写。也有的题目很好,但

是没有档案资料,也没法写。在西方名牌大学出版社出书的一个要求就是书要一气呵成,有总体感和完整性,如果把这本书变成一个碎片,就不如不写。

剑鸣称赞的戈鲲化一章,原本不在我的写作之列。哈佛图书馆有一个林希文博士,我跟他很熟。有一天我们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附近的 Charles Hotel 旅馆里面喝酒,他问我在写什么书,我说写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他问我写不写戈鲲化。说我不熟悉此人。他说他的办公室有戈鲲化的档案,尚未整理,你要不要来看?我当时在哈佛高研院做研究员,仔细读了这批档案,结果写了戈鲲化一章。

我当时还考虑过把斯坦福大学和杜克大学作为一个案例。

大家知道今年是太平洋铁路建成150周年,斯坦福家族就是靠建这个铁路赚的大钱。看过康奈尔大学历史教授高家龙(Sherman Cochran)写的那本书《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就知道杜克是怎么在中国发大财的,因为杜克在中国赚了大钱,才有今天杜克大学这个私立学校。可以说,斯坦福跟杜克都欠中国人的,应该给中国人设奖学金,或者最起码要感谢中国人。太平洋铁路有华工的鲜血和生命,杜克大学的钱是在牺牲中国人的身体基础上赚的,但是后来还是没写。第一,这本书的篇幅已经很长了。第二,一个人不可能做所有的事。在座各位,如果你们感兴趣,这些题目都可以做。 ■

同学录与“写真档案”里的人像

吴真

反映“教学现场”的照片最后未被《北支》采用,反而是运笔书写的单人照被突出放大,由此可以窥见《北支》作为服务于日本侵华目的之出版物的编辑策略。

上周《文汇报》刊登《一张屡被误作钱稻孙像的照片》,文末云:“说回钱稻孙的照片,钱家后人保存的也已不多,甚至找不出其年轻时的照片,聊将一张他晚年的照片补充版面吧。”

由于钱稻孙(1887—1966)在抗战时期“落水”,担任伪“东亚文化协议会”的评议员、伪北京大学校长,并且连续三届主持“大东亚文学者会议”,为日本侵略者粉饰太平,抗战胜利之后,钱稻孙被视作“汉奸文人”,遭到清算,这大概是造成钱氏照片难觅踪迹的主要原因。

但是钱家后人保存不多,并不意味着钱氏的照片就被“处理”掉了。笔者去年恰好由于写作某论文涉及钱稻孙,曾经尝试着从两个冷僻的途径搜检资料,果然觅得钱氏40岁至58岁的6帧照片,趁此机会作为“热心读者来信”奉上。

第一种获得照片的途径是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毕业同学录。那个时代的毕业同学录制作得颇为隆重,每学系的教员均附有个人写真一张。

1930年印制的《民国十九年国立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师长照片之中,第36页载有一帧钱稻孙写真(图1)。时年43岁的钱氏担任北大东方文学系讲师,当时的东方文学系主任是周作人,在第10页也有写真。1936年《国立清华大学年刊》与1937年《清华年刊》,“外国语文学系教授”钱稻孙,用的是同一张照片(图2)。浅色长衫、板寸头、日式胡子、同款眼镜,乍一看,钱与周还真有点“撞脸”。钱比周年幼两岁,二人的身材、相貌、留日背景、任教大学、专业旨趣皆有许多相似处。这段时期的二人照片的撞脸指数很高,幸好有眼镜边框作为辨识标志。

1945年毕业班的班长张琦翔在《三十四年文学院毕业班简介》提到:“钱先生为人谨严,学校风气,似

乎严肃起来。”从1943年《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民国三十二年毕业同学录》与1945年《北京大学34年毕业同学录》所载钱、周二人照片所见,这段时期,二人的相貌因应了各自的人生遭遇,渐渐有了区分。年过半百的钱稻孙,发须皓白,深深的法令纹显出肃杀之气(图3)。而周的脸庞更为丰腴一些,神情略为平和。

1944年,在南京举行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会议”上,钱稻孙被推举为“议长”,大会特辑介绍道:“钱氏不苟言笑,有国学老夫子之风。”而1942年3月,摄影杂志《北支》画刊刊载了6张“北京大学”特辑照片,主打第一张照片上,作为学校文化象征的钱稻孙,神情畅快,与他平日不苟言笑的作风颇有出入(图4)。1940年秋天,位于东城景山街松公府夹道的文学院新校舍落成,“北京大学”文学院搬迁至新址。《北支》这张照片,取景于钱稻孙与师生们一同步出新大楼的时刻,刻意营造出“新学府师生新貌”的视觉氛围。

钱氏左边开口玩笑的长衫青年眼镜男子,就是名列周作人四大弟子之一的沈启无。1939年的元旦,周遇刺之时,恰好上门访师的沈启无在右边也挡了一枪,因此更受周器重,进入伪北大担任国文系主任。《北支》这张照片拍摄之时,正是沈启无的人生最是春风得意之时。进入1943年,周、沈师徒之间怨气渐生,1944年3月,周在《中华日报》上发表《破门声明》,将沈启无逐出师门,同时令沈氏被北京大学开除。

伪北大设有文理农工医五大学院,《北支》的特辑只拍摄了医学院和文学院。医学院的先进仪器,代表着“西方科学”;文学院穿着长衫的钱稻孙,则象征着“传统文化”。钱氏在此期特辑共有两张照片,一是他与沈启无等师生的集体合影,二是他在书房

凝神握笔写作的单人照(图5)。

《北支》画刊依托于华北交通公司(日语称为“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这是1939年4月由日本陆军总司令部设立的一家军方公司,在华北从事交通的建设与管理。1939年至1945年,华北交通公司的特派员在中国拍摄了近四万张照片,其中经过审核的一部分照片刊登于《北支》画刊上,大部分照片封存于公司仓库。1945年后,华北交通公司所拍35000多张宣传报道用的库存照片入藏京都大学,2019年2月,京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新公开了这一批“华北交通写真档案”。笔者在档案中找到与钱稻孙相关的两张照片。编号为35072的《秘书长钱稻孙》,即《北支》1942年3月号所用照片,拍摄时间写为昭和15年(1940)12月,拍摄地点为北京大学本部。编号为35070的《日本文学系主任钱稻孙》,拍摄时间与地点相同,照片上的钱稻孙手持课本正在授课(图6)。

这张反映“教学现场”的照片最后未被《北支》采用,反而是钱稻孙在运笔书写的单人照被突出放大,由此可以窥见《北支》作为服务于日本侵华目的之出版物的编辑策略。另外“华北交通写真档案”中还有四张与钱照片同时拍摄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照片,其中三幅为《北支》的特辑所采用,但是师生一同步出文学院新楼的那张主打照片,却不见于档案中。

长期以来,钱稻孙的照片在网络上被“张冠李戴”,背后有一定的时代原因。民国时期的人物照片,确实不易搜求,但是若能找到路径,聚焦于民国大学的教学手册、同学录,还有日伪时期的出版物以及网络上公开的档案资料,笔者相信,越来越多的照片,会从历史的角落里被翻寻出来。(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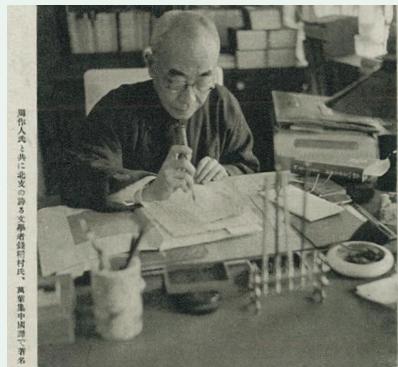


图 5



图 6